

## 为南京「和解」—架起历史深渊之桥（翻译）

小田博志

北海道大学副教授

衷心地感谢村本邦子女士给我这个参加于 2011 年 10 月，在南京举行的研讨会的机会。也向胸怀宽广地来迎接我们日本一行的张连红教授和为我们提供这个相遇机会的沃尔卡斯先生表示由衷的致谢。在此把我个人参加此研讨会的经由，对研讨会的感想和以及 4 天的南京之行的所感总结出来，愿本文能为促进日中和平做些贡献，为此实感幸运。

### 绕道而行的中国之旅

平山顶事件油然浮现于脑海中

也许此行能让我踏上曾经肩负着日中战争的这块土地，成为正视日本关东军在中国的野蛮行为的开端（同许多日本人一样）。

在 2009 年的第一学期，我请了半年的研究假，去了柏林并居住在那里。我的主要研究题目是有关德国历史战争和解和民众的阶层运动。具体是把活动的中心设置在柏林的基督教系的一个团体组织「和平行动·补偿的象征·为和平而奉献（Aktion S ü hnezeichen Friedensdienste）」作为调查的对象。这个团体是 1958 年在罗达·库拉西这个人的号召下设立的。当时因没能禁止纳粹党的非法行为，所以德国国民一直在这种罪过的意识里承受着煎熬，他们便为遭到被害的人而建起「补偿的象征」。这个团体是以奉献活动为目的。现今每年约 180 人为长期志愿者，他们被派遣到 10 多个国家，并且每年夏天在各地都举办着夏令营活动。

我参加了为期两周的在捷克得勒记强制收容所遗址举行的夏令营。其中共同野外调查是在捷克得勒记近郊的里德此这个村庄进行的。确切地说那个村庄是战争的遗迹。捷克从 1939 年起被德国纳粹党所占领，当时的那个副总督海东力西于 1942 年在布拉格被暗杀，他因与执行犯有关被判成冤罪在里德此村被杀害，此事件是在希特勒的指使下执行的。居民大部分（约 500 个）都被虐杀，一些建筑物也都摧毁。整个村落也全消失。如今此处既是痛诉德国纳粹党野蛮行为的地

方也是追悼居民牺牲的地方。人们在这里建起了纪念馆。当时和夏令营的成员一同来参加这个活动的我，不由得想起了「在中国也有同样真实的事件发生过」，那个地方就是平顶山。

平顶山是一个村庄的名字。我在2010年3月去过那里。从东北辽宁省的省会沈阳向东大约坐1个多小时的公交车，就到了抚顺。那里因拥有巨大的露天煤矿而闻名。因此日本关东军极力想占领这块土地。于1931年9月18日在沈阳近郊发动了柳条湖事件。第二年，又建立了所谓的「满州国」这个傀儡国家。抚顺煤矿对日本来说是很重要的煤炭供给源。柳条湖事件的第二年，当地敌视关东军的势力袭击了抚顺煤矿。对于当时的日本来说，发生此事是非常痛心疾首的。在寻找犯人的过程中，关东军怀疑这与离煤矿最近的村落平山顶的抵抗势力有关。1932年9月16日关东军把平山顶的居民都集中到一个地方，为了警戒关东军实行大屠杀。更残忍的是把还活着的人用枪和剑胡乱刺杀。据说第二天，把堆积成山的尸体倒上重油烧掉。用炸药摧毁屠杀现场的悬崖，然后把尸体埋起来。据说牺牲总数为3000个人（平山顶山事件诉讼辩护群团2008）。奇迹般地幸存下来的几个原住民，战后向东京地方法院起诉，要求赔偿。判决虽然承认了集团大屠杀的这个事实却拒绝所索赔。平顶山大屠杀事件可以称为是「亚洲的里德此」。因比里德此居民虐杀事件早发生了10年，所以倒不如说里德此是「欧洲的平顶山」比较恰当。

平顶山事件牺牲者的遗体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被发掘。1972年建起了「平山顶殉难同胞遗骨馆」，把当时发掘出来的遗骨，原封不动地展示在那里。现在作为历史写照平顶山事件的博物馆附设「平顶山惨案遗址纪念馆」。在我访问那里时，还设置了日语翻译。

本文作为南京事件的研究报告，用如此长的篇幅来描述平顶山事件，这是因在南京事件之前，日本已有侵略中国的历史。为了更好地正视南京大屠杀事件而写的。因平顶山事件是在日中战争开始5年前发生的。战后约1000个关东兵被收容在抚顺战犯管理所，他们自身也认识到所犯的罪行。在东北哈尔滨罪恶滔天的细菌，毒瓦斯兵器的开发，人体实验等臭名昭著的731部队遗迹，至今现存，那里现今作为博物馆也可供大家参观。

就这样经由欧洲绕道而行，这就是我所看到的中国人惨遭日本军加害的遗迹。我对于历史没有任何认识，就直接踏上中国土地的很多日本年轻学生，实感羞辱。

但是恐怕像我这样的日本人也并不少。这也许是构造性的问题吧。或许日中两国相隔的墙壁太高或许记忆的长河太深。所以为此我想我必须在这块土地上架起一座桥梁。我所经历过的就是意味着这些，一定亲自去那里和跟当地人相互交流，我期望参加这次的南京研讨会。

## 在南京的 4 天

第一天上午，张教授同时进行了关于南京案件的讲习和故事剧场。那时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的是听到了一个学生的所感：「对自己的祖母和关东兵有种非常矛盾的心里」据说战争时关东军给过这个学生祖母的糖果。但是祖母的父亲（这名学生的曾祖父）又被别的关东兵给残杀。对日本兵的并不是单一的仇恨感情。类似这样的所见所闻不去现场是体会不到的。

第二天的上午访问了幸存者夏淑琴。夏女士她 8 岁时亲身经历过南京大屠杀。父母和祖父母以及 3 个的兄弟都被日本兵给杀害，母亲和姐姐被日本兵强奸。她自己又被枪和剑等刺得遍体鳞伤，最后和年幼的妹妹一起在家忍受了 14 天之后被救援。夏女士痛诉着：“哭啊哭啊直到哭得眼睛都看不见为止。”“「伤口很大，至今有时还感觉到疼痛。」”对此有个日本著述家出版了一本叫「谎言」的书。夏女士对此气愤至极，向南京以及东京法院提出名誉损坏诉讼。东京地方法院对夏女士的诉讼给予承认，并因被告的上诉被最高法院拒绝，所以夏女士得以胜诉。来南京之前，有关夏女士以及她个人的一些事情我真是一无所知，感到无比羞愧。她把「日本军国主义者和民众」分开对待，她说：“你们是无辜的。”（对参加这个研讨会的人）那时我们感到十分欣慰。夏女士是如何改变自己的想法的呢？也许在通过在日本诉讼判决时，感受到很多日本的声援者的温暖了吧？也许这才是修复彼此关系的一把好钥匙，我想去详细地向她询问一下。

能够在这此开研讨会，协助人沃尔卡斯先生的存在起到了极大的作用。正因为他在，大家才放下心，开诚布公地把话说出来。正如和平学者约翰·伽如道古先生所言彼此和解一定需要「中介人」。沃尔卡斯先生正是最好的人选。

第三天，感觉看到了故事剧场的真正价值。有许多来参加的日本人，都变成了被控诉战争的对象，感到有种说不出的压抑感。其他的日本学生想起自己慈祥的祖父，作为志愿军去参加战争，不由得和祖父之间产生一种困惑和动摇的感情，这种感情气氛比故事剧场增大了许多，从战场上活下来的人把真实的记录告诉给

后人，感到一种成就感，此时才认识到要多站在对方的角度才能真正促进和解才是。沃尔卡斯先生用「相互人性化」的来表达。就是面对面，把所有能诉说出来的都倾诉出来，这是切实可行的。这个研讨会也体现了这些，事剧场也能促进人性化，能起到一个非常独特的作用。

最后一天，大家在扬子江沿岸的燕子矶公园的「遇难同胞纪念石碑」前举行了追悼仪式。这里是被日军追逼的中国人想远渡对岸，却牺牲的地方。现在这里成了旅游景点，有很多中国人来此旅游。当日本人和中国人合成一组向纪念碑献花时，有些入园人站在那里向我们寻问在做着什么呢？其中有个在学习日语，想去日本九州留学的青年。因为我们的献花仪式使他们排成了相当长的队。虽然是非正式的，但是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交流。

到了研讨会尾声时，让每个人都边带着回忆各自表达一下感想。我说：“我们是座桥梁”，应多互相理解，就是多站在对方的立场去换位思考。这4天，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尝试做了好多事。就好像已超越历史的深渊，架起了中日往来的一座桥梁一样。

### 所虑之事 1：「东亚」的独特性？

这个研讨会，是用科学研究费补助金进行的一个研究项目，作为「把日中战后代作为研究对象，开发新东亚型历史·和平教育程序」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召开的。其中目标之一是对沃尔卡斯先生「HWH (Healing the Wounds of History)」的理念，也许是考虑到东亚独特的条件，去修正、应用的。

所谓「东亚型」是什么，判断这个问题的本身不是简单的事情。「欧美崇尚个人主义，东亚崇尚集体主义」这种类型论，其实毫无根据的，很死板的化刻板印象（思维固定模式化）的。尝试所谓「个人主义 vs 集体主义」的背后个人主义更现代的、先进的、然而集体主义仍然是社会的一个特征，后者像是为前者进步而服务，暗藏着一张进步图。把这张图放在「近代西方」社会进步的最前端，「西方」好似是自我意识中的一种幻想。应该有选择地去接受。「西方人」也有集体主义的行动，「东洋人」也会出现个人行动主义行动。这个差异不是原则上的问题，而是为了在情况里起到连贯作用的复杂的表达方式而已。

其他也有「这样的东亚特征在欧洲又会怎样」？「这样的日本文化与中国文化有何不同」？各种框架已经普遍深入到每个人的思想意识里，令人感到困惑的

是，不只是对一般人而言，比如在心理学、社会学、文化人类学的这些领域里也蔓延着像刻板印象一样的学说。这样的思维模式与现实生活截然不同，在没有反思的前提下，在当今的现实实行中行不通，恐怕也会有脱离现实的可能。

原本「东亚」是否有自己的独立单位？与其他有所不同，就连是否具有独特性在此不很明确。「亚洲」就是原本「欧洲」所说的不是很方便的领域划分地区。

研讨会期间，一名中国参加者说「日本不承认战争的失败是因为日本具有着“耻辱的文化”所以也不谢罪」。所说的「日本耻辱文化」的这个观点也是典型的千篇一律刻板印象。那个所言人，恐怕是读过鲁思·本尼迪克特的《菊和刀》的中文译版吧。文化人类学者本尼迪克特没有来过日本，只是战争时在美国国内强制收容所里，他采访过日裔美国人，他通过日译英的一些书籍，把「日本文化」等用固定的方式记述下来。那些最终不过是架空的建筑物。实际上对于「日本文化」「日本人」的侧面记述也有很多不贴切的内容。当今的文化人类学家，指出那些记述与日本文化有所不同，「日本文化」实质上是否存在，持有批判的意见。

总之，问题是「东亚实质上是个什么样的社会」？「日本兵的残酷暴行的背景下，是否与日本文化有关」？「对此中国文化又是个什么样的文化」？我们并不是要论述这些「要超越那些刻板印象，作为‘人’我们如何再重新相逢」，或者「为此需要的又是什么」？这些才是重要的。

但是我认为具有重要意义的是，要具体分析来考虑一下已构成「东亚」历史上的，地政学的要素的不同。最大的问题是，和欧洲不同的是东亚地区至今仍然残留着冷战结构。社会不断地分割着，就是朝鲜半岛分割成北朝鲜和韩国的这个事实。

现实东亚的形成不仅是在地理上的构成，除此以外还有美国和俄罗斯，特别是美国于1951年急着与缔结圣弗朗西斯科和平条约，那时把日本战后的赔偿责任在政治上弄得很暧昧。在东西冷战中日本把自己套进自营阵。至今美国仍因中国和北朝鲜「安全保障上的威胁」等借口而相持不下。在日本和韩国不断地设置军事基地。可以说这种分割已成为东亚战后和解的一个障碍。还要注意的是修复友好关系和解的当事人限定于日中之间的话，会潜在还包括美国的宏观结构。

冷战构造不是绝对的墙壁。在欧洲，尽管有同样冷战后政治结构上的困难，西德（当时）的年轻人往来于波兰，譬如作为史迹整備奥斯威辛集中营，然后在那里建设了住宿、学习、交流设施「奥斯威辛青少年国际交流中心」。一个人的

力量虽然是微不足道的，我相信就是这一个个微小的活动因子才会形成一个无穷的力量。

## 所虑之事 2：同一性？

「同一性」是本次研讨会的关键词之一。当时只设定用一个国家的「国民」的同一性这个词，分成 4 人一组进行讨论。有人说「我是中国人」还有人说「我是日本人」，我说：“我是人，是 20 万年前出生在非的人”时，好多人都感到很惊奇。为何同一性这种思想意识必须以一个国家的国民为单位呢？原本「同一性」就像「食品的有限期」（上野 2005）一样过去的概念，必须一定有使用这种概念的必然性吗？

我直率地阐明：我必须接受「构筑主义」的这种看法（上野 2001）。我是「日本人」我是「中国人」我是「男人」我是「女人」这个所谓的范畴，然后连接起来被一种性质所固定。现实中是不存在的。这种构筑主义我认为应当把它看作是在历史的长河中慢慢地形成的一种概念。

这个地球上原本不存在国界。那是人随便划出来的。然后再把国境线内的人圈起来，最后统一下内部的多样性，用来强调与外界的差异。因此国家这个结构组织也就随之成立了。作为一个国家的国民的同一性（或许是「日本人」，或许是「中国人」），不过就是作为一种概念而制定出来的。

我认为从构筑主义的立场，不是为了玩赏思考本身，而是为和平的需要而制定的。以国家这个单位把人分成类，统合起来的这种想法也就是民族主义。通过教育和媒体的宣传，国家的国民的「同一性」被渗透到每个人的内心世界，就好像相信一个非常明了的哲理一样深信而不疑。这在民族主义历史起到了暴力性的作用。相当于成为各国民众的总战力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一样，其次就是更惨不忍睹的第二次世界大战。

用心理创伤和罪恶的单位来维护国民，如此会可能把民族主义在叫做研讨会这个微观的场面上会再生产。总而言之千万别陷入「民族主义」的这个圈套里？我感觉到好像这次研讨会是围绕着「（中国）国民和（日本）国民的和解」这个故事构成办的。但是，用民族主义来驱使人们发动战争从根底上克服是，以国民这个单位去分类，可以从思考或者「同一性」的这个框架本身中解脱出来吗？把很明了的民主主义「同一性」作为前提，为了从此解脱出来，我们做的是必要的

永久的和平工作。

为了从「同一性」和刻板印象解脱出来，需要考虑一下如何被那些形式所镶嵌上的？

此次研讨会，每个参加者自身谈论「同一性」这个问题，然后又把日中的这两把椅子相互而立来互谈，这些都是为了让我们意识到刻板印象的这个框架。可是如果别的研讨会上，是没有机会让大家进一步去反思去挖掘刻板印象。为此我反而觉到最后「日本人」「中国人」这个两元式的区别。正如上文那个学生所诉的：“对日本兵和祖母那种困惑和动摇的感情一样”。人是生活在现实中，两元化这个问题是难以阐述清楚的。解决两元化这个问题，汲取微小的力量去做多元化的工作，又会如何呢？

这是个「继承心理创伤的世代」范围的问题。（这种心理创伤被继承到何时呢？）原本在考虑「和解」的这个问题上，早已想定基本上的问题「谁与谁的和解」。并且「谁来参加这个研讨会」，这些都作为相关的参加条件。如果即是「日本人」也是「加害者」，那这些年轻人一定还要继承着祖辈和父辈们的「罪过」吗？提起中国人，有多少人成为「中国人」「受害者」的子孙呢？在民族主义方面上，国民有时被象征成「家族」这样的趋向。如果用「我们是加害者的子孙，他们/她们是受害者的子孙」的观点看问题，是否能放入民族主义这个范围内呢？

某个民族全部都是「受害者」或者「加害者」是绝对不可能的。历史上发生的事情，不应固定为某个特定的民族。一定要抓住人类历史上发生的事件吗？曾经是受害者的民族时也有可能为另外的一个时代的加害者。也需要人类从历史的视点抵御这些问题。张教授第一天所陈述的就是要「从人类的视点来扑捉南京事件」我也持有同样观点。并且在国际讨论会上「南京事件的记忆」（1999年，华盛顿大学）的加拿大布鲁克博士提出，「把过去人种·民族间的对立构造的虐杀历史记录下来究竟有多大意义呢？日中战争中发生的事件，也应当做人类的问题来考虑」我也有同样的想法（笠原 2002: 293）。

我自身「作为一个日本人」想了解南京大屠杀的历史。因此不想从「日本人」的这个单纯划分区域里逃脱出来。我是个生在日本，长在日本的「日本人」这是千真万确的。同时我也知道肩负着一些政治责任。但是我的存在还原不了「日本人」里，这也是确切的事实。

在研讨会上经常对「感情」作为一个焦点。从构筑主义的立场看，感情也是

在社会上·政治上塑造而成。在这里回忆一下为何具有这种感情，内省工作是必须的。需要具有形成反思感情的过程的这些才智。曾拥有犹太系的父母，在纳粹党政权下从德国向巴勒斯坦逃跑的社会心理学家坦波路与纳粹党党员的子孙和大屠杀生存者的子孙一起共同工作。在他们当中参加者，据说为了尝试他们的命名，并非一定要使用「和解 reconciliatoin」这个词。用「回顾和相信 To Reflect and Trust」这个名称（Bar-On 2008: 198-207）。在这个组织里，避开根据（「德国人」「犹太人」）这些「集体同一性」的讨论，相互叙说个人的故事，就是在接受对方。在此再反思一下要从集体同一性这个刻板印象（思维固定模式化）中解脱出来，参加者们不属于任何一个属性，而用「第三者的角度」来看这些问题。

### 所虑之事 3：伴随着面孔和姓名的记忆

亲临那块土地才体会到远远超过书面上记载的那些内容要生动得多。我由南京返回日本后，身边的笠原十九衙门先生所编写的著作作为主阅览了一番。于是比以前更能顺畅地更具有实感地理解了好几个方面。

其中有本书是『南京事件和日本人』（笠原 2002）所叙述的是牺牲者的「面孔和姓名能浮现出」这个地方的论述很重要。就是让我把遇到幸存者·夏淑琴女士，谈起南京事件时，夏女士具体的面孔和姓名能浮现出来，这是很重要的事情。在这里引用一下笠原先生的文章。

「至今日本人回顾南京大屠杀时是缺乏记忆牺牲者的「面孔和姓名」（p. 249）

「我们所谓不知道受害者的名字和面孔，相反就是我们不想记忆起牺牲者曾受到的悲伤和痛苦。」（p. 250）

「在日本把南京大屠杀数量问题过少地论述，重要的是，不是数量的问题而是每个牺牲者都在南京过着属于自己的幸福生活时，有一天因日军的侵略和野蛮行为失去了生命。据说在南京中国人的亲戚被杀害，女性被强奸，一想到每个人承受着的痛苦，让我们必须想起牺牲者每个人的面孔和名字。」（p. 250）

我感到这是个非常重要的指出。不仅是南京事件，历史上任何各大暴力事件，回顾历史时常常是用抽象的概念和数字来解释的例子很多。「大屠杀 600 万人犹太人成为了牺牲者」这个说法就是个典型的例子。所以类似这种暴力，如果只是这些，这场屠杀只不过是「他人之事」。相反「如果自己遭遇上」，「如果自己



的家人成为了牺牲者」这时会具体地深思考虑，牺牲者的痛苦会有同样感受。

在参加 2011 年 10 月末在广岛召开的日本和平学会的研究集会时，在酒店餐厅看到「中国新闻」（2011 年 10 月 29 日 15 页）有这样的报道。在中国随军的某原日本兵，自费出版了自己的战争加害体验（「面对自我历史 滨田的鹿田先生自费出版」）。作者在这本书写道，在中国袭击村庄时，「父亲为了庇护患病女儿，可又在她父亲眼前把那个孩子给杀害，把俘虏的人当做人体实验等毫无隐藏地记录下来」。以前举行这样讲演时，本人要叙述曾犯下的残酷暴行，对自己的儿女婚姻是否有影响，他们也有过很痛苦的时期。可是，那时「想起同样袒护自己女儿的中国人的父亲，感到很愕然失措」据说从那以后，发誓证言活动作为他的毕生事业。

这个人正是「自己和那个中国的父亲和立场调换」。这个小故事，意味着战争和军队组织如何把他人当做「敌人」非人化，然后通过士兵在再那里做些非人化行为。并且再把人从归于人性化可需要多大的力量啊！

总之，是否能感觉到「他人的疼痛」是抑制暴力和维护和平的根本上的重要条件。但是根据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的划分，人际关系被所分割，又会筑起「痛觉的墙壁」。于是墙壁的外侧的人感觉不到疼痛而失去知觉。

要摧毁这面墙，正如笠原先生所言，用伴随着牺牲者具体的面孔和姓名的方式来记录下来，应该用「记忆的人性化」去做。在南京的研讨会上听到夏女士的谈话，我更确信了应该这样做。然后再加入「感情移入 empathy」的工作里。试着想像「如果夏女士是自己的祖母」。我想也能需要。体会到上述的原日本兵所经历的同样的过程。这个经过，阅读一下和中国归还者联络会原日本兵的记录也有同样的感受。自己（日本兵）想像到在战场上杀害的人，和自己一样都是同样的人的时候，这也是具有决定性的转折点。

本次研讨会的会场南京师范大学的地区，以前曾是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美国宣教师米妮沃特琳（1886-1941）曾任那里的教员。记录着南京女性受到日军性暴力（沃特琳 1999）。沃特琳在书中写道：“南京所发生的，希望日本女性也应有所知作为女性是不能容忍的”。他期待着在日本国内也应该引起反响。这是通过男女社会性差别向他人的感情移入。把人性化做作为一种记忆，为他人感情投入，也许会有多种多样的渠道吧。

#### 所虑之事 4：跨越其他现场来领会

要克服历史的分割，世界各地都在进行和解同和平工作。经验和智慧的积蓄是庞大的。在那里不学是行不通的。我们的「同事」和「先辈」存在世界各地。在这个研讨会上主要是用了艺术和心理疗法的方法。欧洲的「行动·补偿的象征·和平奉献」，通过机能化的工作（建筑和对老龄人的关怀等）实现了和解。我在「擦窗户」和「用耳朵来倾听」（小田 2012）的论文里介绍了一个真实的例子。这个布拉格的事例是纳粹党支持者的孙子，访问犹太系的大屠杀幸存者年迈人的家庭时，就是用擦窗户这个具有实用性的工作发挥了巨大意义的。同上所述，去从事补偿的象征的志愿者们，在邻接波兰的奥斯威辛集中营痕迹那里，建设起国际交流中心。这里作为学习、住宿的地方，现成为「和平的基础设施」被许多人可使用。像这样多种渠道上去和解。对于解决南京问题，尝试开拓日中关系，我们会有一好多好多路径去思考。

#### 希望：不仅都是心理创伤还要有和平的记忆

想着和平，不知不觉话题转换成了战争。我们的讨论往往会向如此倾向发展的。为了再不发动战争，把战争悲惨性作为个焦点，留在记忆中是有必要的。但是如果维持和平，没必要再向悲惨战争迂回，和平它本身就是我们的焦点，一定要铭记在我们的内心的世界。然后朝着那个方向前进。但是，可以怀疑「和平的存在」。不可能像绘画中描写的那样完整无缺，那样的和平是不存在的。但是，让我们换位思考一下，即使在最激烈战争中也存在着和平。就像黑暗中的阳光一样，应该从阳光中寻找焦点，汲取知识，然后变得更强大，这才是接近平，光明的方法。

政治学者玛丽·卡如分析冷战后发生的南斯拉夫内战和卢旺达的种族灭绝等，就是所谓的「新的战争」的『新战争论』。非常深远有趣地指出在「所有的「新的战争」里，可以发现由于排外主义对抗战争的人民和地区。譬如称呼自己为胡图族，在自己的地区大量虐杀里保护图西族和胡图族的人们，特别是在萨拉热窝和波士尼亚等图兹拉这样的城市，人们都是没有特定民族集体所属的，和一些置身于和平解决的索马里兰的长辈们，他们都是为了要彻底保护市民性的多文化主义的价值观」（卡尔多—2003：14-15）。在凄惨的旧南斯拉夫，卢旺达，索马里等的武力纠纷进行中，也确实有不加入战争维护和平的人，但是他们是少数派。

可是我们如何做才与他们一样。为了给未来带来更大希望，从那里我们应该得到更多有的学习的。类似这样的记忆，都是为了促进和平的丰富资源。把历史中积极的侧面作为焦点，我希望正是在这个研讨会上可汲取的宝贵经验。

在南京事件中，有「良心的日本人官兵」，也正是在现场遇到的约翰·玛吉美国宣教师们记录了这些（笠原 2005：338-344）。为此可以想起日本兵吧？他们最终还是少数派，这也是很例外的存在。如果有多数派，南京事件本身也会阻止不会发生。虽说有良心的日本人兵存在，其他的士兵所犯下的残酷罪行也免不了赎罪的。提起「良心性」，原本他们也支持过侵略中国。但是一般人被列入为人道主义犯罪的情形时，即使存在少数犹豫不定的人，这岂不是还具有一定的意义的吗？他们为何能做那样，也有必要去探讨一下吗？对于南京事件，把一些有良心的日本兵的存在说成是「和平的回顾」这也是过大的评价。不光是有心理创伤的回顾，而且类此侧面回顾，给我们——有极限的——给人性化也带来了希望。

日本和中国的历史不仅是侵略和战争，如果追溯到约 20 万年前，我们的祖先是同样在非洲诞生的数千个智人的（奥本海默 2007）。少数的祖先从非洲出来，分散到世界各地。那里的后裔们偶然分手，分别住在日本和中国，随着时代的延续，倭国和日本，接着又有隋·唐朝的差异变迁。中国作为先进地区，日本人不顾安危去那里留学。相反中国孙文和周恩来等来日本，学习一些明治维新以后的日本情况。

历史持续向前，周恩来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抚顺战犯管理所收容约一千名日本兵宽大以待，给予他们反思和赎罪的时间。那些日本兵 6 年后，回到日本，结成「中国归还者联络会」，一直活动于他们加害行为的证言中，用直接加害的行为来反思自己，他们的活动是自发性的。这在全世界上也是罕见的。伴随着老龄化的「中国归还者联络会」在解散的同时，年轻的世代又结成了「继承抚顺的奇特迹会」。

战后在中国「居住」的普通日本人他们回国后，组成了「ABC 企划委员会」市民团体，在日本启发了哈尔滨的七三一部队的罪行和日军的遗弃化学武器的问题（相马 1997）运动。以南京事件为题材作合唱曲，有个日本小学老师组织合唱团，一直在唱着这首歌。这个「紫金草合唱团」完成了在南京的公演，通过民间艺术的和平交流，确实开展扩大了友好的网络。

这样的和平种子栽种在每个角落，只要放开你的视野就会找到希望。所谓和

平，不是谁把这个万能的存在全部给予我们的。和平的种子刚刚发芽，或从小小的泉水中正流淌着，有一天一定会百泉汇海。

未来的庞大的和平是由无数个小小的和平组合而成，我们每个人就是那一条条小小的泉水！

## 参考文献

上野千鹤子（編）

2001 『所说的構築主義是什么』 勁草書房

2005 『脱离认同』 勁草書房

布德林，米妮（岡田良之助、伊原陽子译）

1999 『南京事件的日子米妮沃特琳的日記日記』 大月書店

小田博志

2012（予定） 「「擦窗户」和「倾听的耳朵」：行动·赔偿的象征·平和奉献和非正式的和解」石田勇治·福永美和子（編）『对于当代德国新的视角』（第4卷）勉誠出版

奥本海默，史蒂芬（仲村明子译）

2007 『人类的足跡 10 万年全史』 草思社

卡尔多，玛丽（山本武彦，渡边翻译）

2003 『新戦争論』 岩波書店

相馬一成

1997 『放置的有毒瓦斯』 草之根出版会

平頂山事件訴訟弁護団（編著）

2008 『平頂山事件到底发生了何事—通过诉讼衔接的日中国民的友好纽带』

高文研

笠原十九司

2002 『南京事件与日本人』 柏書房

2005 『南京民区的百天—外国人多看到的大屠杀』 岩波書店

Bar-On, Dan

2008, *The Others Within Us: Constructing Jewish-Israeli Identit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